

法治文化

LEGAL DAILY

2026年2月8日 星期日

主编/王宇  
见习编辑/尹丽  
美编/高岳  
校对/魏巍  
邮箱/fzwh202678@legaldaily.com.cn

扫码阅读  
阅读本文

红色法治地标



在河北乐亭这片红色热土上，李大钊纪念馆是故乡人民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的精神圣地。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从1920年年初开始，李大钊等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就商议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领导建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大钊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和战士，而且是20世纪初我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位杰出人物。他留下大量著作、文稿和译著，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新闻学、图书管理学等诸多领域，为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受尽严刑拷问，始终坚守信仰，初心不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同年4月28日，李大钊惨遭反动军阀绞杀，牺牲时年仅38岁。

李大钊纪念馆始建于1996年8月，1997年8月16日落成开馆。纪念馆占地面积130亩，建筑面积8656平方米。主要参观景点有：李大钊生平事迹陈列展览、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展览等。

新观察

王延川

近期，名为Moltibook的网站聚集了约15万个智能体，引发全球热议。有消息称：这些智能体在社区内共享信息、讨论观点、相互点赞，发布的帖子中不乏调侃甚至声讨人类的内容。这个智能体“朋友圈”仅对人类开放旁观权限，人类无法参与其中。有人担忧，这些智能体是否会组建机器人国家、构建自身文明，更有人发出感慨：“AI活过来了，人类被边缘化了，我们正在见证历史。”

2024年11月25日，美国Anthropic公司发布模型上下文协议，该协议让大语言模型能够连接数据源。自此，从功能层面而言，智能体超越了仅能进行语义输出的大语言模型，从只能在实验室中完成感知、推理和行动的系统，转变为可调用外部工具，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系统。基于这一重要技术突破，2025年也被业界称为“智能体元年”。

尽管智能体已从实验室走进现实应用，但关于其定义，学界尚未形成理论共识。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智能体发展迅猛，目前仍处于未定型阶段；二是智能体核心技术路径存在差异，多数人认可大语言模型是智能体的“大脑”，但也有观点认为，基于规则及神经网络的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1月1日，北京，4.6万名群众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天安门广场，只为见证那抹最耀眼的“中国红”冉冉升起的时刻。

“向——国旗——敬礼！”7时36分，洪亮的口令划破长空，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旗手振臂扬旗，万目光凝望，五星红旗缓缓攀升。

“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天真无邪的孩童，眉宇明亮的少年，眼神坚定的老者，上万个声音汇聚成同一首歌，激昂澎湃的歌声在天安门广场回荡。

“在天安门看升旗、唱国歌，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信仰与热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原团长、音乐总监于海的耳中，国歌是最动听的声音。为了维护国歌尊严，他在担任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时，连续十年呼吁制定国歌法。

国歌法的出台，使得我国的“第一声音”有了专门的法律守护。多位参与国歌立法的专家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制定国歌法，有利于强化公民的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的精神力量。

守护国歌尊严寸步不让

回顾为国歌立法呼吁的十年岁月，于海至今仍然印象深刻。

2008年，是于海履职全国政协委员的第一年。在这一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他提交了为国歌立法的提案。对于他的这一举动，很多人并不理解——有人认为“有难度”，还有人认为他哗众取宠。

对此，于海不为所动。因为他之所以提出这件提案，并非心血来潮。

1970年考入解放军军乐团时，于海还不满15岁。那年国庆节，作为联合军乐团最年轻的队员之一，15岁的单簧管演奏员于海与乐队成员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奏响了国歌。后来，于海担任解放军军乐团团长，直至2011年卸任。

“在这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仅在正式场合演奏和指挥国歌的次数，有近万次了。”于海回忆。

国歌经常在耳边响起的经历，让于海对国歌有

# 法律守护“第一声音”

## 国歌立法背后的故事

着难以表达的特殊感情。

在重大活动中，有的人在国歌演奏时心不在焉、交头接耳；在一些地方，国歌被乱用于婚丧嫁娶、公司开业等活动；在有的学校里，很多学生不能完整背出国歌歌词……对于不尊重国歌的现象，于海痛心疾首。

正因如此，于海才会在履职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年就提交关于制定国歌法的提案。而当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更加坚定了他持续推动制定国歌法的决心。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于海担任奥运会开幕式解放军军乐团团长，也是开幕式演奏国歌的指挥。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怎么演奏国歌、用什么样的感情、什么样的速度演奏国歌，他与奥运会音乐总监有了不同的看法。

这位音乐总监认为，奥运会上的国歌演奏，可以把速度放缓一点，节奏放慢一些。对此，于海明确反对，“我们的国歌蕴含了战斗精神，必须是激昂的。尽管我俩私底下是很好的朋友，但在这个问题上，我半点没有退让”。

在于海看来，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他与奥运会音乐总监产生分歧的原因，就在于国歌版本的不统一。“对于用什么速度、什么情绪来演奏国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我们的国旗和国徽都有专门的法律进行明确，而国歌在这方面至今仍是空白。”

这让于海认识到，关于国歌立法的呼吁必须继续下去。

十年立法路一生国歌声

从2009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开始，会议的开闭幕式上，由过去的奏国歌改为唱国歌。

2009年的全国两会，在会议议程安排方面作出多项调整，其中明确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将原来的解放军军乐团奏国歌改为在军乐团的伴奏下全体代表和委员齐唱国歌。

“我激动地登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第一次指挥全体代表，委员高唱国歌，非常感慨！”于海说，这不是一般的演绎形式上的简单变化，而是从国家层面引导国人唱响唱好国歌、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

对于于海而言，这个从“奏”国歌到“唱”国歌的变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意义——制定国歌法的梦想，或许很快就能实现。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推动国歌立法，会贯穿他连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始终。在他每年提交的多件提案中，必定会有建议制定国歌法的提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那边负责登记相关立法提案的工作人员，虽然没见过我，但都知道有个叫于海的全国政协委员，每年都会提交关于国歌立法的提案。”于海笑着说。

于海十年如一日的执着，引起了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的注意，二人也因此成了朋友。

“我亲自见证了于海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年复一年，坚持不懈，连续不断地为国歌立法提交提案。我为他‘十年立法路，一生国歌声’的情操感到钦佩，对他的这种热情和努力感到敬佩。”乔晓阳说。

于海为国歌立法的呼声与坚持，影响和打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张国立、关牧村、万安义、冯小刚、吴祖强、梅葆玖、吴雁泽、徐沛东、金铁霖、靳尚谊、冯骥才、莫言、韩美林、卢中南、谭利华、张国勇、阎维文、吴为山、王兴东、梁晓声等百余位政协委员纷纷在他的提案上签名，表示支持。

“从2008年全国政协会议开始，这个字我一签就是十年。每一次签字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怎么这么‘愚’，搞不定的事情还在搞。终于，有一天于海打电话告诉我，国歌要立法了。那一刻，我为他感到高兴，也为我们全国政协委员在履职过程中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当然，这种高兴也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因为捍卫国歌的尊严，就是捍卫国家的尊严，捍卫民族的尊严。”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雕塑家吴为山说。

不平凡的六十八年历程

在于海履职全国政协委员的最后一年，他的念念不忘终于有了回响。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正式公布，根据该计划，国歌法草案定于当年6月提交全国人大

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

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该法对国歌奏唱的场合和礼仪、宣传教育、标准演奏曲谱和官方录音版本、监督管理等作了全面规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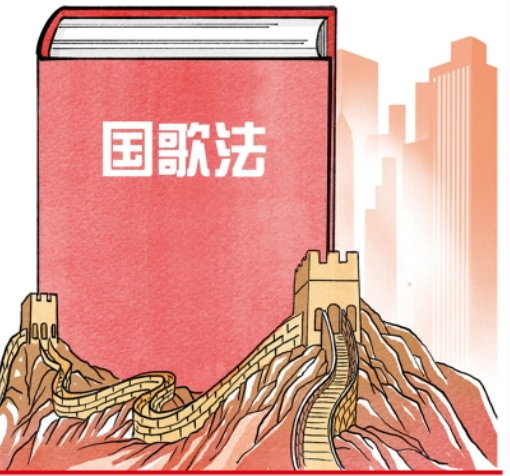
“有的人会讲，无论是否对国歌进行专门立法，我们都会尊重国歌。这句话是不错，但没有法律，还是不一样的。国歌法出台后，国歌的尊严就有了法律守护。”乔晓阳说。

“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国的国歌立法有着不平凡的历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阎珂感慨道。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由于没有如期拟定出国歌，这次会议于9月27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的第三项作了这样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954年制定宪法时，对是否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有争议。因此，1954年宪法只规定了国旗、国徽，没有规定国歌。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歌的决定，采用《义勇军进行曲》原曲，歌词由集体重新填写。因新歌词引发不同意见，在1982年宪法通过的同一天，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确立国歌的宪法地位。

又过了13年，国歌法出台。此时，距离《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国歌过去了68年。



# 腊月大集上的“法治年货”

##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探索出精准滴灌式普法工作法



图为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司法局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法治年货”。

赵梦阳 摄

法律语言“译”成生活话语。

钥匙扣对准“家”与“和”，那些“依法家更宁”的提醒，瞄准的是乡村常见的邻里宅基地、婚姻家庭纠纷。围裙则是为大娘大婶们准备的，“年前诈骗电话多，我们入户时总听老人们念叨。”于是，“不听不信不转账”成了围裙上最醒目的标语，让它随着炊烟飘进千家万户的厨房。扑克牌则成了反邪教知识的移动课堂，“不信神仙不认鬼，踏实干活最珍贵”这类顺口溜，让牌局娱乐时也能记上几句法律常识。

每个物件的设计都来自前期大量的走访调研。

在药材之乡牛家营子镇，普法“特产包”里会多放几份关于交易合同的“明白纸”；在校园周边，文具盒上“学法明理”的卡通画则成为主角。这正是“精准滴灌”理念的生动体现，彻底告别无差别的“大水漫灌”，通过嵌入不同人群的生活轨迹，让法治真正从抽象的条文，转变为可信赖、可感知的生活伴侣。

日常物件成为普法载体

这些深度融入日常的“小物件”，究竟能否转化

为治理效能？一个前不久发生的真实故事，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不久前，在旗幼儿园附近的路口，一位骑电动车接孩子的父亲与一辆三轮车发生轻微刮蹭。天寒地冻，双方火气都很大，现场气氛紧张。赶来的调解员敏锐地注意到，争执双方都戴着不久前从“法治小摊”领取的，印有“12·4”国家宪法日标识的棉手套。他没有直接引用生硬的交规，而是指了指那副手套，语气平和地说：“两位师傅，都看看咱手上戴的‘守法平安’。事儿不大，咱们按规矩心平气和地解决，好不好？”一句基于共同物品和共同记忆的提醒，如同钥匙开锁，瞬间让对峙的坚冰开始消融。

“可别小看这些不起眼的东西。”事后，调解员深有感触，“因为它们实用，天天见，上面印着的话，不知不觉就成了大伙心里共同的‘暗号’。”2025年以来，喀喇沁旗各级调解组织成功化解的矛盾纠纷1956件，其中，像这样借助“法治年货”潜移默化影响，通过流动普法等方式预先介入并成功化解的纠纷就有300余件。这些印在日用品上的朴素话语，因高频出现而变得无比亲切，早已沉淀为村民潜意识的共识。在争执的紧要关头被唤醒，往往比直接宣讲法条更能叩开心扉，真正实现了从“物品发放”到“行动默契”的跨越。

用平安答卷绘就“新年景”

一年的深耕与持续浸润，“精准滴灌”播撒下的种子，如今在关乎群众安全感、获得感等多个维度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绘制出一幅清晰的基层平安新图景。

下转第六版

# 智能体的机遇与边界

系统也应归入智能体范畴；三是与智能体相似的系统（如具身智能等），未来是否会与智能体走向融合，仍未可知。有人提出，对智能体的认知应从其特征入手，但面对诸多艰深繁杂的技术名词，不少人难免望而却步。

解码“代理型AI”

理解一个概念，最好的方式是回归其本意。智能体的英文为AI Agent，亦有Agentic AI之称，中文可译为“人工智能代理”或“代理型人工智能”。其核心定位是作为“代理”存在——本应由人类完成的事务，可交由智能体代为执行。这一定位，使得智能体与人工智能家族中的专家系统、机器学习、大语言模型等产生了本质区别。

现有人工智能的核心功能多为语义输出，表现为“你问我答”的模式，本质是人类与机器的直接互动；而智能体突破了单纯的人机关系，充当起人与人之间的中介，其执行任务的过程及结果，会直接影响人与人的关系及利益。

现实中已出现智能体作为代理的案例，其中一则反面案例颇具代表性。2022年，加拿大男子杰克·莫法特为出席祖母葬礼购买机票时，向航空公司聊天机器人咨询是否可享受丧亲折扣，机器人告知其可在旅程结束后申请。然而，莫法特事后申请折扣时遭拒，航空公司称其网站乘客须知中明确规定“已完成的旅程不允许退款”。

自主与交互两大特点

作为代理的智能体，在功能上与其他人工智能形成分野，这些特殊性正是理解智能体的关键所在。

其一，自主执行概括性任务。相较于智能体，现有的人工智能更像是“信使”——信使的任务具体而明确，例如“将这封信交给某人”，需严格遵循委托人指令，是纯粹的工具体，无任何自由裁量权；而代理的任务多为概括性，例如“代为采购一套机器设备”，委托人无法下达细致指令，代理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

现有的人工智能无法完成这类概括性任务，而智能体具备一定规划能力，能将概括性任务拆解为多个具体子任务，按步骤推进完成，这一特性与人类处理复杂事务的逻辑相似，以“招聘职员”这一概括性任务为例，智能体会自主拆解为“审核申请人是否符合入围条件”“对入围者排序筛选”“确定录取人选”等子任务，全程无需人类针对每个子任务下达指令；而现有的人工智能招聘系统，需人类对每个子任务分别下达指令，才能逐一完成决策。由此，智能体不再是亦步亦趋追随人类的工具，而是具备一定“自主性”的系统。

其二，与环境交互并实现自动进化。现有的人工智能基本不与外部环境交互，例如向大语言模型提问时，

它仅能在自有数据资源范围内作答，若超出该范围，要么直言“不知道”，要么生成虚假信息。而智能体作为代理，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常与外部环境互动：当无法依靠自有数据完成任务时，会主动借助搜索引擎等外部工具获取信息；这种与外部环境的持续交互，促使智能体不断学习，优化自身参数、工具使用方式及任务策略，进而提升对环境的适应性。

智能体除了独立完成人类交付的任务，还能通过交互协作攻克复杂任务。例如，某大学以大语言模型作为语义理解底座，对多个智能体进行真机协同控制，开展智能体协作系统实验。当实验人员发出“我饿了，去拿点吃的”指令后，大模型驱动的协同控制平台立即对任务进行语义解析与动态分配，调度无人机、机械狗及机械臂协同执行：机械狗检测厨房门状态并将门打开，无人机集群飞至实验室外的食品放置处，机械臂将食物放入篮子，最终由无人机集群携带篮子返回实验室。

智能体的普遍应用也引发了一些法律问题，亟待解决的是智能体带来的责任缺口。智能体致人损害会面临这样的追责困境：开发者抗辩系统为合格产品，若有问题可能源于系统自动进化；使用者抗辩系统不可控制，且造成的损害结果无法合理预见；理论上智能体可以负责，但其作为没有意识和财产的机器，事实上无法承担责任。该问题已引起全球法学界及法律实务部门的高度关注。

智能体目前发展的局限性

但目前这类交互协作仅能在少量智能体之间实现，且多为“一对一”的单线关系。而大型社群的形成，不仅需要“一对一”交互，更依赖“一对多”“多对多”的复杂交互网络。因此，就智能体现有交互水平而言，组建大型社群尚不成熟，更谈不上建立国家、构建自身文明。有研究对Moltibook网站上6159个活跃智能体发布的13875条帖子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高达93.5%的评论无任何回复，内容高度模板化，缺乏真实有效的双向交流。这种状态并非智能体间的紧密互动，更像是六十多个机器人在“自说自话”。

智能体能够与外部环境交互、自主执行概括性任务，无疑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节点。借助工具完成任务的特性，让智能体更贴近人类，但智能体与人类的这种趋同仅停留在形式层面，尚未构成真正的智能革命。一方面，智能体尚未成为通用机器系统，仍局限于特定领域执行任务；另一方面，智能体缺乏人类所具备的意识、情感与意志，和现有人工智能一样，它对自身执行的任务毫无认知，无法感知其意义。这些局限性决定了它难以发展为超级人工智能，更不会对人类构成实质性威胁。

（作者系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陕西省法学会互联网法律与治理研究会会长）